

# 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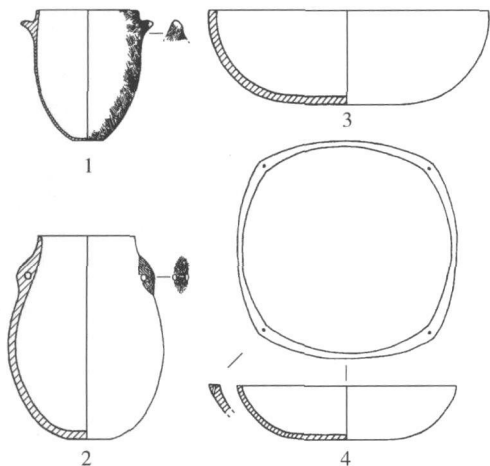
张弛(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教授)

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河南南部的淮河上游地区,遗址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1983~2001年共发掘7次,揭露面积为2600多平方米<sup>[1]</sup>。这是当时所知裴李岗文化时期面积最大、发掘面积最大、揭露遗存最丰富的遗址。前6次的发掘报告完整地报道了发掘的内容,将所有遗存分为三期九段,通过与周边其他同时期文化和遗存的对比,认为贾湖这三期遗存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是与裴李岗、磁山等考古学文化同时并存的一支独立的史前文化<sup>[2]</sup>,命名为“贾湖文化”。但同时报告也认为在贾湖三个时期文化的遗存中,“一、二期之间的变化要大于二、三期之间的变化,一、二期之间有不少器形的变化似较突然”<sup>[3]</sup>,说明贾湖一期遗存还有较二、三期更独特的特征。近年来,随着发掘的类似贾湖一期遗存的增多和资料的披露,以及相关发现的不断出现,更加深了我们对这类遗存的认知。

贾湖一期遗存在贾湖遗址三期的堆积物中虽然相对较少,但仍然是迄今这类遗存发现

数量最多的例子,贾湖遗址前6次的发掘揭露房址、墓葬、灰坑、窑址等遗迹共148处(大多属于第一期第三段)。典型的陶器有绳纹或素面角把罐、素面方口盆、双耳罐、罐形壶、深腹盆、敞口钵等(图一)。这批陶器多数为夹砂陶,多有红衣,特别是罐形壶的红陶衣十分鲜明。仅在二、三段出现少量泥质陶和夹蚌(亦夹砂)陶,但数量不超过3%。而第二期第四段以后,泥质陶的比例占42.9%以上,并出现大量的夹蚌、云母、滑石和夹炭陶。第五段以后的贾湖二、三期,陶器的种类中基本没有第一期的典型器物如角把罐、方口盆、双耳罐、罐形壶等,器类以卷沿罐、鼎、小口壶、三足钵以及各种钵类为主。而第四段的器物种类更接近第一期,只是陶质更接近第二、三期,也有研究者认为第四段应归入第一期更合适<sup>[4]</sup>。贾湖第一期与第五段以后的二、三期的陶器群完全不是一个系统。如果撇开贾湖一期的文化内容,则贾湖文化的特征与裴李岗文化至少在陶器上就不易区分了。

与贾湖一期遗存基本相同的内容还有在豫西南邓州八里岗新近发掘的最早一期遗



图一 贾湖遗址一期陶器

1. 角把罐(H278:1) 2. 罐形壶(M376:1)  
3. 钵(H115:18) 4. 方口盆(H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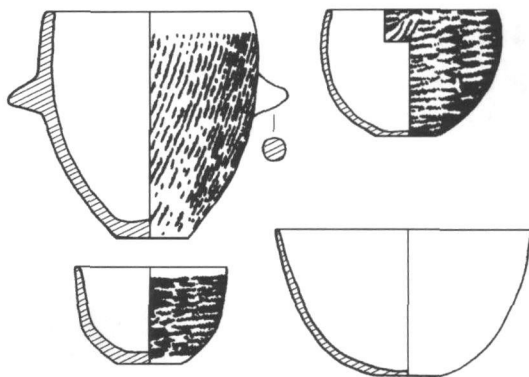
存<sup>[5]</sup>,主要是10多个灰坑或窖穴。陶器均为夹砂、云母的红陶、红褐陶,器类以各种素面角把罐、绳纹罐和四角盆为主,占有器类的90%以上,其他仅见一些钵类、盖和个别桥形纽的残片。这里的绳纹罐没有复原者,也可能是角把罐。所谓四角盆实际上是在盆沿上附加4个上面有穿孔的尖突,与贾湖遗址的方口盆是一种器物,区别是贾湖遗址的方口盆的圆角近方,在圆角处加厚唇沿并穿孔。而角把罐的形制更与贾湖一期没有区别。

据相关研究披露,在豫西渑池班村遗址也出土了一批类似贾湖一期遗存的陶器(图二),被称为“班村类型”<sup>[6]</sup>。相关遗存发现房址7座、灰坑56个。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占83%以上,多为红陶或红褐陶,其他还有夹云母陶和泥质陶。陶器的种类主要是角把罐和钵类。其中角把罐多饰有绳纹,角把的位置较贾湖的同类器稍靠下,残片的比例占44.05%。钵类中主要是绳纹钵,占25.3%,另外还有泥质红陶钵和三足钵,分别占17.26%和5.06%。其他的器类还有个别鼎足、瓢、杯、盆等。发掘和研究者认识到班村这类遗存与裴李岗有较大差别,与贾湖一

期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但倾向于认为是与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同一级别的考古学文化<sup>[7]</sup>。由于班村的资料未发表,是否能进一步分期尚不清楚,这里还无法讨论。

豫西地区的其他相关遗址还有新安荒坡遗址和济源长泉遗址。其中在荒坡遗址发掘灰坑3个<sup>[8]</sup>,出土陶器为素面粗泥红褐陶和夹炭红褐陶,常见的器形为角把罐和钵。其中角把罐的形制与贾湖一期和八里岗的同类器相同,一件“未名器”T20H33:1上有双孔马鞍形横鏊,这样的横鏊在贾湖一期三段和二期四段的敛口钵上较常见。在长泉遗址发现灰坑4个<sup>[9]</sup>,其中H65与H49所出角把罐、三足钵均不相同,前者的角把罐有绳纹,角把接近腹中部,具有班村同类遗存的特征,后者的角把罐为素面、折沿,角把在沿下上翘,类似临汝中山寨<sup>[10]</sup>、郟县水泉<sup>[11]</sup>和贾湖三期的同类器。

在豫中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含有贾湖一期遗存的遗址只有长葛石固遗址一处<sup>[12]</sup>。石固遗址已发掘的面积较大,发掘报告中将这里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分为四期,有研究者对这个分期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石固I、II期的大部分遗存与贾湖三期相当,石固III、IV期大致与贾湖二期相当<sup>[13]</sup>。实际上石固III、IV期中有的角把罐如H101:4、H94:1等近似于贾湖一期的同类器,IV期I式盆(T33②:16)、II式盆(T6②:9)在沿下有4个穿孔鏊手,不少单位出罐形壶和折肩壶,这些特点与贾湖一期三段和



图二 班村遗址出土陶器

二期四段十分相似。

总结上文可以看出, 贾湖一期遗存的特征还是十分鲜明的, 其陶器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 很少有泥质陶。陶器的类型主要是素面和绳纹直口小平底角把罐和各种钵类, 特别是口沿上有4个穿孔突起釜手的钵最有特色, 在东部还有红衣罐形壶等器物。其中分布于豫西南或豫南的贾湖一期和八里岗最早期遗存的年代相当, 器物形态也最相近。豫西的班村、荒坡和长泉相关遗存至少相当于贾湖一期三段至二期四段, 但器物的形态具有当地特征。豫中的石固相关遗存与贾湖一期三段、二期四段接近。这类遗存与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sup>[14]</sup>, 以卷沿罐、鼎、小口壶、三足钵等器物为特征的裴李岗文化完全不同。过去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它的特色, 但或者认为属于贾湖文化的早期, 或者认为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早期<sup>[15]</sup>。为清楚起见, 本文暂称这类遗存为“贾湖一期遗存”, 但包括贾湖二期四段。定义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为裴李岗文化, 在贾湖遗址是二期五段及其以后各段的内容。从贾湖遗址的分期看,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群显然是在贾湖一期之后才出现的。

## 二

上文的讨论实际上大多是以贾湖遗址的分期为标尺进行的, 对于相关遗存相对年代的确认并没有能够细致到贾湖分期中“段”的级别, 只是大致明确了贾湖一期、八里岗这类“贾湖一期遗存”和裴李岗文化的定位, 以及大致落在二者之间且陶器面貌更像前者偏晚阶段的石固有关遗存以及豫西班牙村、荒坡和长泉的相对年代位置。因此下面对于绝对年代的讨论也只能在这个年代级别上进行。为此, 可以将已经发表的相关遗存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成五组来讨论, 即贾湖、八里岗、裴李岗文化、石固、班村, 以便确定各类遗存的绝对年代。

在这五组数据中, 目前已有的贾湖的19个样本数据比较散乱<sup>[16]</sup>, 并不完全与陶器分期相

吻合。其中比较有规律的是木炭的数据普遍偏早, 人骨和草木灰的数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样本BK95013和BK95017都是人骨, 分属一段和五段, 但绝对年代近似。贾湖报告在详细讨论了这些数据形成偏差的原因之后, 认为第一期的校正年代为7000~6600 BC, 第二期的校正年代为6600~6200 BC, 第三期的校正年代为6200~5800 BC<sup>[17]</sup>。其中一个一期二段果核样本的年代为7050~6600 BC (BK91007)<sup>[18]</sup>, 应当没有偏差, 可以作为贾湖一期的一个年代定点。第三期中较晚的数据应当接近贾湖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的年代。

在八里岗早期遗存中目前已经测定了15个数据, 样本中1个为果核, 2个为稻谷, 其他均为木炭。这些数据的年代较集中, 年代最早的一个BA08129(H1987木炭)为6700~6480 BC, 年代最晚的一个BA08122(H1986②木炭)为6390~6080 BC。2个稻谷样本的年代分别为6530~6420 BC (BA10080)和6600~6440 BC (BA10081)。与贾湖一期的年代相互参照, 可以认为贾湖一期遗存的年代不晚于6000 BC。贾湖果核样本(BK91007)的数据属于一期二段, 则一段的年代应当更早。因而整个贾湖一期的年代很可能为7000~6000 BC。给出一个有把握的时间定点则应当是八里岗稻谷的年代, 即为6500 BC前后。

裴李岗文化一组的数据出自裴李岗、中山寨、莪沟、水泉、铁生沟、花窝、马良沟、沙窝李遗址, 共18个<sup>[19]</sup>, 均为木炭样本。其中除了裴李岗遗址本身的一个数据即8780~8290 BC (ZK-0572)年代过早, 一个数据即8000~5700 BC (ZK-0434)过于宽泛, 一般不为研究者采用外, 其他数据中最早的为6700~5850 BC (裴李岗ZK-0754), 最晚的为5750~4800 BC (裴李岗ZK-0751), 其余数据均集中在6000 BC前后, 普遍晚于上述贾湖一期的年代。如果考虑到这组样本均来自木炭而所得数据很可能偏早, 我们可以估计以裴李岗遗址所见的裴李岗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应当大致为6000 BC及其

之后。

石固遗址的3个样本WB79-60(6460~6090 BC)、WB80-15(6370~6010 BC)、WB80-17(6030~5720 BC)也均为木炭,分别出自报告中II、III、IV期的H159、H238、H197<sup>[20]</sup>,查阅报告中的灰坑统计表<sup>[21]</sup>,其中前一个灰坑出壶,后两个灰坑出折肩壶、三足钵,均为裴李岗文化或接近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器物,3个年代也都在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范围内,前2个年代还偏早。当然这3个数据很可能都不是石固遗址早期接近贾湖一期遗存的年代。

班村遗址的两个年代都很晚,一个木炭样本BA94088(4100~2700 BC)的年代已经到了仰韶文化时期,一个果核样本BA94087(6070~5610 BC)的年代在上述裴李岗文化偏晚的年代范围内<sup>[22]</sup>,这两个数据与上节对这批遗存相对年代的分析不符,由于详细的资料尚未发表,其意义无法讨论。由于豫西地区长泉遗址(H49)、孟津寨根遗址<sup>[23]</sup>、巩义瓦窑嘴遗址<sup>[24]</sup>均出有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存,而且这3个遗址的遗存是前后相接的,其中并没有与班村遗存同时期的迹象,因此推测班村遗存的年代应当早于裴李岗文化时期,否则就没有了班村遗存的年代位置。

由于本文没有检讨贾湖一期和裴李岗文化的详细分期,甚至没能真正确认两者之间的界限,因此无法给出它们各自的年代,只能从上述讨论中得出一个大致的年代定点,即贾湖一期遗存的绝对年代应当为6500 BC前后,本文定义的裴李岗文化的绝对年代为6000 BC前后。

### 三

关于贾湖一期遗存取食经济的内容,目前发表的资料最丰富的是贾湖遗址的资料。在前6次发掘的报告中,分析了浮选出来的1000多粒炭化稻米的样本,通过粒型分析并结合9个样本的稻属植物硅酸体研究,认为贾湖水稻是一种粳籼分化尚不明显且含有野生稻特征的

原始栽培稻。报告中还对贾湖人骨作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贾湖人的食性以C3型植物为主,未见以粟、黍等植物为主的C4型食物。此外,还分析了在遗址中发现的野生稻、栎果、野菱、野大豆,认为贾湖时期的稻作农业虽然发达,但这类野生植物性食物的存在说明采集经济仍然是重要的补充。

在贾湖遗址的第7次发掘中,对125份土样进行了定量浮选,其中分别属于一期、二期、三期的土样各有34份、63份、28份<sup>[25]</sup>,但仅有59份土样出土了炭化植物遗存,共发现4121粒植物种子、228块块茎残块、7872块硬果残块。分析报告按照植物种类的出土概率对这些样本进行了统计,发现与农耕生产活动相关的植物种类的出土概率均不高,其中稻谷的出土概率为15%,两种田间杂草马唐属和稗属的出土概率均不到5%。而在与采集活动相关的植物种类中,硬果壳核(菱角等)和块茎残块(莲藕等)的出土概率达30%以上,野大豆和栎果的出土概率均达20%以上。因此推断当时的取食经济活动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

贾湖遗址第7次发掘的植物分析报告还特别指出,这些样本中第三期的样本的数量很少(依所发表的统计表统计,第三期的28份土样中出土的植物遗存合计仅有45粒),没有统计的意义。上述引用的统计结果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贾湖一、二期的情况。由于报告只分期发表了植物个体的数量,而没有分期的植物出土概率的情况,这里只能粗略地对比一期和二期的个体数量。值得注意的是,二期的土样份数约为一期的两倍,但一期却出土了4倍于二期的稻谷(324:78),两种田间杂草的数量也是一期多于二期。而采集经济植物中除数量较少的种类外,一期的栎果多于二期(267:97),但一期的菱角少于二期(116:7307)。因此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贾湖一期农耕活动的比例大于二期。为了回应根据贾湖前6次发掘出土水稻粒型研究,认为贾湖水稻可能是药用野生稻的

看法<sup>[26]</sup>,有关研究还发表了第7次发掘的水稻粒型测量数据,发现贾湖稻粒从一期到三期有一个从大变小的趋势<sup>[27]</sup>。年代最早的家猪也出现在贾湖一期<sup>[28]</sup>。

从近年发掘的八里岗遗址贾湖一期遗存11个灰坑土样的浮选中,出土的完整稻粒有22个,稻属穗轴516个,另外还出土稻残片148个,糠子116个。从出土概率看,糠子出土于2个灰坑,而稻见于绝大多数灰坑。此外,还发现了疑似黍和野生大豆的植物遗存,但黍的个体较小,很难判断是未成熟的黍还是野生黍。这两类植物的数量都很少,且仅见于一个灰坑。由于样本量和出土单位的数量都不多,很难据此得出一定的结论<sup>[29]</sup>。但可以看出,八里岗遗址和贾湖一期的植物性食物的来源是相似的。

对八里岗贾湖一期的每粒稻米的长、宽、厚进行测量,并与贾湖、跨湖桥、龙虬庄、八十垱、田螺山的稻米粒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八里岗稻米的粒型更接近跨湖桥出土的材料<sup>[30]</sup>。对八里岗这一时期的灰坑H2000出土水稻穗轴(样本数量占有516个穗轴的84%)的鉴定结果显示,驯化型占71.5%,野生型占10.4%,其余为不成熟稻和未能鉴别的穗轴<sup>[31]</sup>。目前有两组数据可略作比较,在同样区分为驯化型、野生型、不成熟型的田螺山出土的2461个小穗轴样本中,早、晚两个时期的驯化型小穗轴分别为27.4%和38.8%,演化时间为300年(6900~6600 BP)<sup>[32]</sup>。在仅区分了粳稻型(驯化型)和野生型的跨湖桥、罗家角、田螺山出土的小穗轴中(样本数量分别为120个、100个、351个),粳稻型的比例分别为41.7%、51.0%、51.0%。研究者按跨湖桥的年代为8000 BP,罗家角、田螺山的年代为7500 BP计算,500年这里水稻的驯化速率为9%<sup>[33]</sup>。如果同样按照三分法统计,则后一组数据中罗家角、田螺山的数据与前一组田螺山的数据应当是差不多的。从单一地点单一时期的样本数量看,八里岗H2000的小穗轴样本数量少于前一组田螺山的数量,多于后一组的三个地点。而八里岗H2000

小穗轴中驯化型的比例要大于这三个地点,时代也早于跨湖桥遗存(关于时代的讨论详见后文),甚至略大于目前仅有的良渚数据<sup>[34]</sup>。如果小穗轴形态的区分能够说明水稻的驯化程度,那么在距今8500年前后的八里岗贾湖一期遗存中就已经有驯化程度很高的水稻品种了。

其他地点如班村遗址仅有很少的相关资料,已发表的有班村类型的H2033、H1010的浮选结果<sup>[35]</sup>,出土了大量的朴树内果皮、山茱萸果核、栎属子叶块、紫苏坚果、野大豆,应当属于采集性食物遗存。

#### 四

贾湖一期遗存在淮河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区的出现应当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目前北方地区还没有找到或者没有能够确认与贾湖一期同时的遗存。在南方地区,与贾湖一期遗存明显有相似性的则有钱塘江流域的小黄山早、中期遗存<sup>[36]</sup>和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sup>[37]</sup>。尽管目前所见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分布相隔较远,但它们的陶器群都相对简单,应当具有相同的时代特征。颜色鲜明的红衣罐形壶是这三种遗存均有的器类。贾湖一期的罐形壶与小黄山的壶相似,小黄山也有竖孔横釜盆,只是釜手在盆的中部。小黄山早、中期的年代为7000~6000 BC(校正后数据)。彭头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是釜、钵,贾湖一期的陶器则以角把罐、方口盆(四角盆)为主,这两种器物实际也就是釜、钵一类,在两种遗存的陶器群中均占有器物的80%~90%。彭头山文化的测年数据主要为6500 BC前后。

此外,小黄山晚期是跨湖桥文化一类遗存<sup>[38]</sup>,而跨湖桥文化与贾湖二期都有时代特征明显的折肩壶,跨湖桥文化的绝对年代比贾湖一期晚而接近贾湖二期<sup>[39]</sup>。在长江中游地区与跨湖桥文化同时的是皂市下层文化<sup>[40]</sup>和城背溪文化,在这两种遗存中也有折肩壶,城背溪文化的枝城北、青龙山遗址还出土了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三足钵和折沿角把罐等器物<sup>[41]</sup>,也应

当与裴李岗文化大致同时。因此可以间接确定贾湖一期的年代早于跨湖桥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小黄山中期与跨湖桥文化、彭头山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及城背溪文化的传承关系，恰与贾湖一期遗存与贾湖二期及裴李岗文化的传承关系可以对照。

时代在贾湖一期遗存之前，在河南发现的近万年的文化遗存先有舞阳大岗细石器遗存<sup>[42]</sup>，后有近年新发现的新密李家沟有陶遗存。类似大岗的细石器文化在李家沟被叠压在有陶遗存的下面，3个木炭样本的年代为距今10500~10300年（引文校正数据）。显然是细石器文化传统的李家沟有陶遗存，其陶器很少有绳纹，是滚印竖点纹遍布器身的盂、罐类器物，年代为距今9000~8600年（引文校正数据）<sup>[43]</sup>。如果这个年代无误的话，正与贾湖一期遗存前后相接甚至有所交错，显然不是贾湖一期遗存的前身。贾湖一期遗存陶器群的主体是角把罐与盆搭配，其中角把罐多饰绳纹，为直口、小平底，也就是釜一类器物，方口盆（四角盆）则是钵一类器物。与北方类似东胡林遗存的万年以来罐和盂作为炊器的陶器群不是一个传统。而釜与钵的陶器群搭配则正好是长江中游地区万年以前自陶器开始出现就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sup>[44]</sup>。贾湖一期遗存中稻属与橡子并用的生业形态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在晚期以前的传统。因此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应当是南方人群向淮汉和黄河中游地区扩张的结果。而大岗一类细石器遗存在距今10000年之后退缩到豫中，约距今8600年后完全退出了华北南部地区。

贾湖一期遗存出现的时代正是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际，随着暖温带和亚热带的持续北迁，在长江中游地区类似彭头山文化的人群逐渐北迁。根据上山等遗址的发现可知，南方地区至少在冰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利用稻属植物的生业经济<sup>[45]</sup>。而在大暖期来临之前，无论从现代野生稻的分布还是历史上的发现情况看<sup>[46]</sup>，淮汉一带应当是没有野生稻的地区或至

少是野生稻分布的边缘地区。根据稻作农业起源的边缘起源论<sup>[47]</sup>，生活在亚热带北缘的人群既缺乏野生稻资源，又有更大的对耐贮存植物性食物的需求以渡过较亚热带南部更漫长和寒冷的冬季，同时也由于野生稻种群的缺乏，隔绝了与栽培稻种的基因交流，使得栽培稻的演化速率在大暖期来临之际的淮汉地区贾湖一期遗存中明显增快。这就解释了上述贾湖一期遗存中有关稻作农业相对发达的现象。实际上，在这个时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内（跨湖桥文化和皂市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甚大，但长江下游小黄山、跨湖桥文化稻种的演化程度却远不及淮汉地区的八里岗，这或是因为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与淮汉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同。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稻作农业边缘地区起源论的合理性。

从现有资料分析，贾湖一期遗存偏早时段主要分布在淮河和汉水中游一带，偏晚时段往北往西分布到了豫中和豫西，已经覆盖了迄今所知裴李岗文化的分布范围。考虑到贾湖一期遗存的陶器、石器以及生业形态均与裴李岗文化有继承关系，甚至贾湖一期墓葬中死者头侧放置陶壶的习俗也是裴李岗文化中常有的现象<sup>[48]</sup>，因此可以认为裴李岗文化乃至人群应当来自贾湖一期。贾湖一期遗存的文化因子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源头。目前研究者一致认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就是裴李岗文化分布的区域，这显然与其前身贾湖一期遗存农业发展的程度相对较高密切相关。此外，分布在豫西地区的贾湖一期遗存——班村类型的主体器物是绳纹角把罐和绳纹钵，与关中地区老官台文化（或白家文化）以绳纹三足罐和绳纹钵为主体的陶器群相似。老官台文化（或白家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裴李岗文化偏晚的时期，与班村类型的年代相接，在关中地区迄今找不到文化来源，因此很可能是班村类型的后续文化。如果再扩大范围来看，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的时代与裴李岗文化相

当,陶器群也是以釜、钵类为主,食物遗存中也同样有稻属植物<sup>[4]</sup>,估计也来自与贾湖一期遗存同一时期类似的南方文化系统。可以想见,黄河中下游地区 6000 BC 以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形成主要是长江流域和淮汉一带文化及人群北进的结果。

本文对贾湖遗址一期遗存的认识,看上去似乎是意在揭示一种“贾湖一期文化”遗存的存在,但贾湖一期遗存已发掘和已发表的资料并不多,文化的分布区域和年代也不十分确定,还有很多相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根据现有资料,仅从陶器群、绝对年代和经济形态三个方面提炼出这类文化遗存的文化和时代特征。判断这类以角把罐和有釜手的钵为特征的遗存,其内涵不同于裴李岗文化,年代早于裴李岗文化,大致与南方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小黄山文化同时。其来源应当是南方的长江流域,在全新世大暖期即将来临之际向北方黄河流域扩展,在与北方新石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发展为黄河中游的裴李岗和老官台等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也应当是由这类遗存同时期的相邻遗存发展而来的。有线索表明,这类遗存中的稻作农业在当时的取食经济中所占比例虽不大,但稻种的驯化程度很高,甚至高于时代晚于这个时期的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所在的地区。种植农业可以应对或补充华北南部寒冷的冬季以及采集经济歉收的年景,这应当是贾湖一期遗存能够迅速向北扩展的主要原因。而在它向北扩展的同时与华北北部同时期旱作农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以后需要关注的课题。总之,贾湖一期遗存在全新世大暖期到来之际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奠定了此后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基础。

附记:笔者得到刘莉、郑云飞、秦岭在有关水稻小穗轴研究方面的指教以及王海明在小黄山遗存分期方面的指教,在此致谢。本文获

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方向明确的基础性探索研究课题“中国农业起源及早期发展研究(2009)”的资助。

- [ 1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2001 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 年第 2 期。
- [ 2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第 531 页,科学出版社,1999 年。
- [ 3 ] 同[ 2 ],第 502 页。
- [ 4 ] 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 年第 2 期。
- [ 5 ] 张弛《邓州市八里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第 268~ 269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报道完成于遗址的发掘工作刚结束而陶片尚未经过整理之际,因此文中对这个时期器物的说法多有不确之处,当以本文为是。
- [ 6 ] 张居中《试论班村遗址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第 157~ 163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 [ 7 ] 同[ 2 ],第 528~ 531 页。
- [ 8 ]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新安荒坡——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三)》,第 13~ 17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 9 ]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第 11~ 16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 10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考古学报》1991 年第 1 期。
- [ 11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郟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95 年第 1 期。
- [ 12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第 1 期。
- [ 13 ] 同[ 2 ],第 529~ 530 页。
- [ 14 ] 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 年第 2 期;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

- 报》《考古》1979年第3期。
- [ 15] 同[ 4]。
- [ 16] 同[ 2]，第515~516页。
- [ 17] 同[ 2]，第515~519页。
- [ 18]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碳十四年代数据为利用OxCal3.0版本校正的树轮校正年代，可能性为95%。
- [ 19]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804~8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 20] 同[ 12]。
- [ 21] 同[ 12]。
- [ 22] 同[ 6]，第160页。
- [ 2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等《寨根新石器时代遗存》，《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 [ 24] 巩义市文物管理所《河南巩义市瓦窑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7期。
- [ 25] 赵志军、张居中《贾湖遗址2001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考古》2009年第8期。
- [ 26] 秦岭等《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 [ 27] 刘莉等《关于中国稻作农业起源证据的讨论与商榷》，《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 [ 28] 罗运兵、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第1期。
- [ 29] 邓振华《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第9~11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 [ 30] 同[ 29]，第20页。
- [ 31] 同[ 29]，第28页。
- [ 32] Dorian Q Fuller, Ling Qin, Yunfei Zheng, Zhijun Zhao, Xugao Chen, Leo Aoi Hosoya, Guo-Ping Sun, 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and Domestication Rate in Rice: Spikelet Bas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Science*, Vol. 323 pp. 1607-1610, 2009
- [ 33] 郑云飞等《7000年前考古遗址出土稻谷的小穗轴特征》，《科学通报》2007年第9期。
- [ 34] 同[ 32]，第1609页。
- [ 35] 孔昭宸等《澠池班村新石器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人类环境学上的意义》，《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18卷第4期。
- [ 36] 王海明等《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掘》《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王海明《浙江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的探索与思考》，《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 [ 3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垅》，科学出版社，2006年。
- [ 3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
- [ 39] 同[ 38]，第222~227页。
- [ 40] 焦天龙《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报》第八辑，文物出版社，2006年。
- [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第117-139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 [ 42] 张居中、李占扬《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5卷第2期。
- [ 4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发现——新密李家沟遗址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2日。
- [ 44] 张弛《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 [ 45] 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第9期。
- [ 46] 范树国等《中国野生稻的种类、地理分布及其生物学特征》，《面向21世纪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年。
- [ 47] 严文明《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 [ 48] 张弛、魏尼《裴李岗文化墓葬随葬品研究》，《古代文明》(第7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
- [ 49] Gary W. Crawford, 陈雪香、王建华《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王霞)